

正义是否击败了时间

——中国人战后补偿诉讼的十年历程

要把“绝对不可能”变为“可能”——这是不屈的律师们热血沸腾地谱写出的诉讼记录。面对国际人权侵害事件，为数众多的律师们团结起来，像开凿难以打通的隧道那样，一次又一次地凿落坚硬的岩石。这样的诉讼过程，是超越国境，实现人类共同正义和理念的斗争，通过这一斗争，他们展示给世人的，是作为律师，同时也作为一个人，令人格外向往的人生方式的典范。

昆仑出版社

中国人战争被害
补偿诉讼律师团
朱春立 余文 编

战·争·记·忆·与·历·史·反·思

正义是否击败了时间

——中国人战后补偿诉讼的十年历程

中国人战争被害赔偿诉讼律师团 编
朱春立 余文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正义是否击败了时间 / 中国人战争被害赔偿请求事件律师团编;
朱春立、余文译. —北京: 昆仑出版社, 2006

ISBN 7-80040-865-5

I. 正… II. ①中…②朱…③余… III. 中日关系-战争赔偿-研究 IV.D8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41716 号

本书编著者为中国人战争被害赔偿请求事件律师团, 日文版由日本评论社出版, 关于中文出版权, 作者方与该出版社事先约定, 该社不要求拥有。中国人战争受害赔偿请求事件律师团已将此书中文出版权无偿授予昆仑出版社。

书 名: 正义是否击败了时间

编 者: 中国人战争被害赔偿请求事件律师团

译 者: 朱春立 余文

责任编辑: 殷实

装帧设计: 裴海斌

责任校对: 吕红英

出版发行: 昆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35

电 话: 66531659

E-mail: jfj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朝阳燕华印刷厂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A5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8.5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80040-865-5/I·647

定 价: 22.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要把“绝对不可能”变为“可能”——这是不屈的律师们热血沸腾地谱写出的诉讼记录。

面对国际人权侵害事件，为数众多的律师们团结起来，像开凿难以打通的隧道那样，一次又一次地凿落坚硬的岩石。这样的诉讼过程，是超越国境、实现人类共同正义和理念的斗争，通过这一斗争他们展示给世人的，是作为律师、同时也作为一个人，令人格外向往的人生方式的典范。

——森村诚一

目 录

第一章 挑战艰难课题	1
第二章 诉讼之路	21
加害者与受害者的对话 / 22	
——七三一、南京大屠杀、无差别轰炸诉讼	
无法开口讲述的痛苦经历 / 36	
——山西“慰安妇”诉讼	
向世人证明自己的清白 / 47	
——海南岛战时性暴力受害者诉讼	
白骨在向人们诉说 / 56	
——平顶山事件诉讼	
遗留下来的负面遗产 / 65	
——旧日军遗弃毒气、炮弹受害者诉讼	
中国劳工诉讼洞穴生活十三年的刘连仁 / 74	
——抓掳劳工及“外务省报告书”（东京诉讼）	

- 在地方提起的首例诉讼 / 85
——持续了七年多的法庭斗争（长野诉讼）
- 沉寂的法庭 / 94
——没能传达到法官的真实（北海道诉讼）
- 从法庭上的“和解”到问题的真正解决 / 105
——京都诉讼
- 走向胜利的里程碑 / 112
——法官为什么能作出胜诉判决（新潟诉讼）
- 两年完成的一审诉讼 / 121
——事实改变了法官（福冈诉讼）
- 在南国宫崎丧失的生命 / 136
——宫崎诉讼
- 起诉当地企业 / 145
——山形诉讼
- 在判决中认定的事实 / 152

第三章 法律上的论争	173
法庭上追求的国际意识 / 174	
——关于“个人请求权”	
克服战前的亡灵 / 186	
——关于“国家无答责”	
正义是否击败了时间 / 198	
——关于“时效、除斥”	
最后的壁垒——“请求权放弃论” / 210	
理论与实务的架桥 / 220	
——法律论：诉讼上的到达点	
第四章 来自国内外的支援	231
第五章 克服过去 走向未来	241
“克服过去”以及对未来的责任 / 242	
我们的追求和愿望 / 254	
后 记	265

第一章

挑战艰难课题



长春、伪皇宫陈列馆

永野茂门否认侵略历史的发言

一九九四年五月，羽田内阁的法务大臣永野茂门在就职时的记者会上表示，“南京大屠杀是捏造的”，否认亚洲太平洋战争的侵略性质。^①

就在前一年的八月，当时的首相细川护熙刚刚就过去的战争承认了其侵略性，表示了反省和谢罪——这在历代内阁中是第一次。因此，永野茂门的发言，给中国政府和民众一个强烈的印象：这是日本政府历史认识的大倒退，理所当然地此一发言招致了中国方面的猛烈批评。

这时正巧有一个日本法律家访华团在北京访问。这个名称为“中国司法制度调查团”的访华团由18名学者和律师等组成，由日本民主法律家协会^②应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邀请派出，团长是小田成光。他们访华的目的，是对中国的司法制度进行调查研究，恢复因文革而中断的日中法律家的交流，建立新的合作关系。日本民主法律家协会事务局长小野寺利孝律师是该访华团的一名成员。

① 永野法务大臣5月3日前会见每日新闻记者时说：“南京大屠杀什么的，我认为是在捏造的。”他讲述的理由是“那之后我去了南京”。对于太平洋战争，他说：“说那场战争是侵略战争，那是错的。如果问是不是以侵略为目的去做的，我说不是的。（那时）曾认真地考虑了解放殖民地、解放（大东亚）共荣圈。”

② 1960年创设的法律家团体，是追求和平、民主主义和人权的法律家们的广泛的联合组织。

司法制度调查团经南京、上海，五月五日到达北京，这时他们得知了永野茂门的发言。在南京，他们刚刚访问了展示日军战争犯罪行为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置身南京事件的现场，接触日军战争犯罪带来的活生生的受害事实，他们感到震撼——那种感觉同书本上的记述带来的感觉完全不同。一九八二年的教科书检定等问题，使得日本国内否认南京屠杀的存在、否认侵略战争的错误历史观日渐增强，据说南京纪念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的。在参观过程中访华团得知，建成的纪念馆成为对儿童和青年进行历史教育的场所。

对南京的访问使团员们意识到，要谋求两国民众的友好合作，相互之间建立人与人之间的信赖关系是必不可缺的，这就要求日本方面必须在侵略战争带来的战争犯罪的事实上，确立正确的历史认识。

调查团一行带着上述感受来到北京，当得知了永野法务大臣的发言，在愤怒的同时，他们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感。他们决定以律师团的名义发表抗议声明，要求羽田首相罢免永野法务大臣。

五月六日，调查团将抗议声明分发给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媒体，小野寺等人以调查团代表的身份访问了日本驻华使馆，要求罢免永野。接待他们的使馆官员表示，中国方面反应很强烈，同时日本国内要求罢免的呼声也很高，暗示法务大臣有可能辞职^①。

① 永野法务大臣的发言在日本国内外招致了强烈的批评，5月6日，他以发言不当为由，将发言撤回，但仍然无法平息对他的追究，5月7日向羽田孜首相递交了辞呈。

民间对日索赔动向的扩展

虽然当时在日本还不太为人所知，但在中国，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战争受害者对日索赔的动向逐渐增强，开始成为日中两国间新的政治课题，而点燃这一导火索的，是北京的青年法律学者童增^①。

童增提出，战胜国对战败国要求的“战争赔偿”，同战争受害民众向侵略国家要求的“民间赔偿”是不一样的，并论证，一九七二年九月的日中共同声明中，中国政府放弃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他认为，侵略了别国的战败国，必须就战争中违反战争法规、无视人道原则、屠杀一般市民和俘虏等重大犯罪，向受害者支付“民间赔偿”。

童增在一九九〇年写了一篇题为《中国对日索赔刻不容缓》的论文，他将论文送交数名人大代表，请他们阅读，并做工作，希望代表们将此文作为建议书，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是，在第二年春天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由50名人大代表提交了中国政府应该对“民间索赔”进行调查，向日本政府要求赔偿的提案——“万言书”。但是重视日中之间的政治安定和经济关系发展的中国，没有使这一提案获得通过。

然而童增的研究和“万言书”的提出，却产生出和他的思考

① 童增在北京化工管理干部学院教授经济法时，欧洲再次提起了“战争赔偿”问题，接触到这方面的报道后，他认为最大的战争受害国是中国，开始强烈关心日本的赔偿责任问题，并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

不尽相同的潮流。他的论文被《法制日报》刊载后，中国许多报纸接连转载，很快就扩展到全国。尽管战争已经结束了四十几年，但身心受到伤害而且并未治愈的中国人，依然存在。“在国际法上，战争犯罪受害者就自己蒙受的伤害向日本要求赔偿，是法律赋予的权利”——童增的提示，使得一九七二年九月日中恢复邦交以来，一直想要做些什么，却又不知如何去做的受害者们，一扫沉闷气氛，得到了吐露心声的勇气。这之后出现了令童增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情况。他所工作的研究室每天都收到来自全国各地战争受害者的信件，一九九三年，其数量超过了一万封。还有人从很远的地方来找他。无论是来信还是来访者，讲述的内容都是自己的受害事实，以及对童增的论文表示支持和感谢，要求日本谢罪和赔偿。其中许多人都认为，如果政府不能去做，就应该由民间去做。怎样才能向日本政府提起“民间诉讼”呢？人们期待着得到支援。

中国政府的对应

中国政府在一九七二年九月的日中共同声明中，放弃了可以依照国际法向日本要求的“战争赔偿”。这是为了构筑子子孙孙的日中友好，不给战后正在复兴中的日本国民增加负担。人们认为这反映了中国政府的宽容精神。

接受了放弃赔偿的恩惠、完成了战后复兴的日本，在经济上高度发展，在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下，构筑了强大的军事力量，开始向政治大国进军。同时，已处于支援发展中国家地位的日本，也用 ODA 的最大份额支援了中国的建设。

然而，在中国仍然有许许多多的人还生活在侵略战争带给他们的痛苦之中。对于这些受害者，日本从没有考虑过对他们“谢罪”，以及作为谢罪的表现，给他们适当的“补偿”。对战争受害者来说，他们似乎除了忍耐，没有别的选择。同时，虽然在日中共同声明中，日本表示了衷心地反省侵略战争和谢罪，并表示要吸取历史教训，绝不再次复活军国主义，但思考日本在其后的表现，受害者们觉得日本似乎背离了共同声明的基本精神，感到担心。

人大代表们了解到受害者的想法，接受了他们的要求，在一九九二年和一九九三年分别向人民代表大会提交了关于战争受害者索赔的提案，尽管未能被采纳，要求“民间索赔”的战争受害者和支持者们的声音，在全国范围内扩展，形成了一定的舆论。

作为对上述舆论的反应，一九九二年三月二十三日，钱其琛外长就对日索赔提案的问题，发表讲话说，“对于侵略战争的遗留问题，日本方面应该认真对待，妥善处理”，肯定了民间索赔的动向。但是，日本政府认为战争赔偿问题已根据日中共同声明而解决了的态度，始终没有改变。从一九九二年到一九九三年，许多战争受害者向日方提出“谢罪”和“赔偿”要求，日本政府全部置之不理。

这时，有十几位愿意和童增一起活动的战争受害者和市民，认为应该持续支持受害者们的要求，决定成立“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委员会”。他们以“筹备会”的名义开始了活动，但由于没获政府的正式批准，不能公开打出委员会的旗号，也募集不到活动经费，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的活动逐渐失去了势头。

陷入困境的战争受害者们，想到了日本的法院。他们认为，除了进行诉讼斗争，没有更好的办法。这是因为，进入九十年

代，韩国的战争受害者作为原告，已开始在日本的法庭进行“战后补偿诉讼”斗争，中国人从中得到了启发。但在日本进行诉讼所需要的知识，对他们来说，当时几乎等于零。

于是他们在中国找律师商量，但中国律师说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和经验，无法提供帮助。还托人找过美国律师，也没找到愿意提供帮助的人。日本律师联合会在一九九三年曾经就中国战争受害者问题进行过调查，并以“战后补偿”为题，召开了研讨会，他们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想了许多办法，但仍旧没能找到同意为他们承担诉讼的律师。时间就这样一天天过去。

K记者提起的问题

在北京支局工作的日本记者K，注意到九十年代初期开始的战争受害者的动向，对童增等人的活动持续进行采访，写了许多关于“民间索赔”的报道送往日本。

对于历史，日本一直以“付诸流水”的姿态来对待，结果是暧昧了侵略战争的历史。与此同时，包括A级战犯在内，将战死的军人当作英灵，供奉在靖国神社，把他们视为神明，政治家们前去参拜，得到许多国民的支持。从美国占领下恢复主权后，日本很快就确立了对过去参加战争的军人、军属发放“恩给”，对死亡军人遗属发放“年金”的国家政策，其金额数目丰厚，直到现在，每年仍要拿出相当数额的国家预算，其累计金额据说约达40兆日元。但是对于自己侵略过的国家的受害者的诉求，战后的日本从来没有打算真诚地面对。

另一方面在中国，据说自己的家人或亲戚中没有任何一个人

受过日本侵华战争之害的人，是很少的。而且，正是通过抗日战争的胜利，构筑了今日的建国基础，人们以此自豪，把这段历史作为现代史的一部分，进行学习和教育。就是说，中国的人们并没有忘记日本的侵略历史。熟知中国的K记者担心，中国民众中积蓄起来的对日本的不信任感，说不定有一天会成为难以抑制的岩浆，这使他怀有一种危机感。

一九九四年五月六日，小野寺律师等人向媒体散发抗议声明时，K记者前来帮忙。为表谢意，小野寺约K记者共进午餐。K记者觉得这是个机会，他打算借机采访日本律师，为中国战争受害者寻找律师获取一些有用的信息。

K记者从小野寺那里采访了日本法律家们的活动情况，尤其是涉及“人权诉讼”的状况。小野寺对K记者的考虑一无所知，他向K记者介绍了日本民主法律家协会的活动，还对K记者有问必答地逐一讲述了自己参加的“公害诉讼”、“尘肺诉讼”^①等诉讼斗争。他带着几分自豪的语调，就日本“人权派”律师们在人权诉讼斗争方面的传统和成果，侃侃而谈。吃完午饭，二人开始喝茶，气氛平静和谐。这时K记者突然提出的问题，却使当时的气氛为之一变。

“既然日本有那么多关注人权的律师，对于日本为加害者的国际人权侵害事件，为什么没有人去做呢？”对于对方突然以强

① 所谓尘肺，是因为连续吸入粉尘，破坏了肺的功能，引起支气管炎或癌症等职业病，在煤矿、隧道工人中多发。国家和企业损害了这些人的健康，使他们处于无奈地走向死亡的无权利状态。为了救助全国的尘肺患者，在日本全国各地提起了尘肺诉讼，1979年组成了“全国尘肺诉讼律师团联络会”。

烈的口吻提出的问题，小野寺律师一时没搞明白，甚至有点受侮辱的感觉。他注意到K记者认真的神态，反问道：“你想说什么？”K记者向小野寺介绍了以前采访过的对日民间索赔问题的基本情况，诚恳地谈了自己对今后日中关系的担心，然后又满怀感情地告诉小野寺，中国的战争受害者们正在寻找日本律师，想请他们作为自己的代理人，追究战争犯罪的责任，进行“民间索赔”斗争。

对小野寺来说，这件事他第一次听说。但K记者说，九十年代的这一新动向，日本社会也有过报道。一九九三年十月，在京都召开的“日本律师联合会人权维护大会研讨会”上，以“日本的战后补偿”为题，谈到了中国人战后补偿，探讨了受害者的赔偿请求权问题。小野寺听着K记者的话，一时无言以答。

小野寺曾经从事过二战朝鲜劳工事件的调查，对已经在日本提起的朝鲜人、韩国人的战后补偿诉讼也很关心。也许正因为如此，在不知不觉中，对K记者讲述的中国战争受害者的状况，以及这期间日中两国政府的态度，小野寺开始热心地提起了问题。谈话中小野寺感觉出，K记者实际上是期待着自己作为日本人权派律师的一员，承担起这一诉讼。想到这一诉讼的分量，还有摆在面前的不计其数的困难，他有些踌躇。然而小野寺知道，“中国人战后补偿诉讼”有其历史意义，而且作为承担过许多人权诉讼案的经验丰富的律师，他非常理解受害者们对律师的强烈期待。此时，如果转过身去，背向受害者，他觉得那似乎是背叛了至今的自己。他下了决心：“如果可以安排参与人权问题的日本律师和战争犯罪受害者会面的机会，一定可以组成一个承担中国人战后补偿诉讼的律师团。我近期会再次访华，同战争受害者们见面，直接听取他们的讲述，同他们商量今后的行动。请你把童增

等有关人士介绍给我。”K记者表示，自己会把小野寺的意向转达给受害者和童增等人。

从一九九五年八月到今天，回顾中国人战后补偿诉讼斗争的十年历程，很自然地使人想起永野茂门法务大臣的妄言所产生的影响。当中国战争受害者进行“民间索赔”的努力面临困境，处于苦苦寻找出路的徘徊之际，他们邂逅了一位站出来批评永野发言的日本律师，以此为契机，中国战争受害者们同为数众多的日本人权派律师走到一起，他们的斗争增添了新的活力，开始向前发展。永野茂门因为他的发言丢掉了法务大臣的职位，同时也因为这个发言，他的名字被记入中国人战后补偿诉讼斗争的历史。

从发起人小组到律师团的组成

调查团一行回国后，在日本民主法律家协会事务局的会议上，小野寺汇报了已经与K记者约好，同战争受害者会面的事，谋求大家的支持。日本民主法律家协会决定全面支持这件事。协会事务局次长、渡边彰悟律师参与过缅甸难民问题，对国际人权问题很关注，表示当年（一九九四年）七月份小野寺访华时要与之同行。另一位次长渡边春己律师鼓励小野寺说，这次可以在总结家永教科书诉讼斗争^①经验的基础上，思考新的诉讼战略。在

^① 家永三郎执笔的日本高中历史教科书，在文部省的检定中，数次被定为不合格，或是被要求附加条件，于是家永三郎以日本的文部大臣为对象，提起了三次诉讼，打了32年的官司。在第三次诉讼中法庭认定，文部省对关于南京屠杀、日本军对妇女暴行及关于731部队记述内容的“检定意见”是违法的。